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
给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向 翔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1991年7月

论 文 提 要

本文提出“党的建设应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时局发展的特点出发”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文章着重分析了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某些因素对党的建设的影响，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图谋日益表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严峻的困难和挑战，是国际大气候中我们不可忽视的两个问题；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不时泛滥，是国内小气候中影响党的建设的主要因素。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党应加强自身的内部建设和处理好外部关系。作者认为，党的自身建设应首先抓住坚持党的性质、加强思想政治作风教育、培养忠实可靠的接班人等三个方面；而处理好党的外部关系，首先要发挥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作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坚持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党管意识形态。这就是在目前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环境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课题。

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 给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向 翔

我们的党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尤其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党就一直坚持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时局发展的特点出发，在组织制度、思想理论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党的建设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新时期，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都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给党的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只有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建设中认真解决这些课题并制定相应对策，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本文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概略分析入手，对党的建设的新课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期引起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一、对国际大气候的两点分析

一种大气候的形成，构成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形成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也是国际大气候的主流。但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主流的背后，却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对我们党的建设至关重要。

1、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图谋日益表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

近年来，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世界性的大战始终没有爆发，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把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目标，不少国家还开展了旨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社会改革。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国际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但和平共处，而且日益“趋同”。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敌视社会主义，妄图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和不战而胜的图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更有不断强化的倾向。

早在四十年代末，当中国人民反对蒋家王朝的斗争胜利已成定局时，艾奇逊之流尽管对当时中国的局面已经毫无办法，但仍把希望寄托在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身上。他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①到了五十年代，杜勒斯仍明目张胆地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

代、第四代身上。他公然声称：“我们远东政策的一个要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工具。这种威望是非常大的。不让国际共产主义取得外部的胜利，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政策。这样做法将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就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援引了艾森豪威尔的话：“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②这说明，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搞和平演变的图谋是由来已久的。

经过“热战”、“冷战”的反复较量，西方资产阶级都未能达到他们灭亡社会主义的目的。自七十年代后期起，他们认真总结了经验，决心改变谋略，采用另一套手法。这种总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尼克松1980年5月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书中尼克松说：“我们要不战而胜，就必须以不进行战争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力量。今天有一种介于和平和战争之间的广大的中间领域，斗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个领域决定。如果我们期望不战而胜，或者哪怕只是期望免于不战而败，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个领域内同对手交锋。”只要认真翻阅一下西方政治家们的言论，就知道他们所说的交锋手段包括电台、报刊等宣传媒介，还包括开展对外贸易、提供技术和资金、进行人员交流、增加财政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旅游等。表面看来，他们做的都是有利于对方的“好事”，但隐藏在这些“好事”后面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苏联人需要同西方接触。他们需要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贸易。今天，他们无法封锁我们的电台广播，明天，他们也许就无法封锁我们的卫星电视广播了。他们无法把自己和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当他们打开门，伸手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就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里去。”整个八十年代，随着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图谋更为膨胀，尼克松就提出了“1999：不战而胜”的明确目标。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手法和要求更为具体化、系统化，并不惜为此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2、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一些暂时的，但却十分严峻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发展，给世界帝国主义造成极大的恐慌，也给广大第三世界带来鼓舞。六十年代初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出现了一些观点和看法的分歧，但都在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多数都是不发达国家，都是从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薄弱环节”中脱胎而出的，有的原来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口文化构成低，工业化程度低，经济商品化程度低；而且，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难以避免这样那样的失误和反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就共同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相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调整了国内政策，利用长期积累（有的是掠夺）的财富和科学技术条件大力发展生产力，表现出相对的稳定与繁荣。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不慢，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经济科技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确有一定差距。这就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各级政府造成很大压力，群众的不满情绪十分容易触发。

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概括地说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建

设方面，二是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由于没有经验，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多有片面性，而学习别国的作法时又往往不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工作多束缚于某种教条和僵化模式。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进行了七十年建设。《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记载的数字表明：从1951年到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7.4%，除低于日本的8.3%外，远远高于美国的3.5%、西德的5.1%、法国的4.6%、英国的2.4%、意大利的4.8%。但是自五十年代中期起，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51年到1955年为11.3%，1956年到1960年为9%；七十年代前期为5.7%，后期降到4.2%；1981—1985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国民收入五年增长18%到20%，年增长率为3.4—3.7%，但实际只增长3.1%。问题还在于，这当中还包含着积累率偏高、职工收入增长明显低于投资增长、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物价上涨等因素，因而人民生活水平实际有所下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与此类似，有的问题更为严重，诸如债台高筑、财政赤字庞大、物价上涨过猛、经济效益太差等等。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似乎还要更多。由于这些国家历史上一一般都缺乏民主制度的充分发展，而执政的党又未能很好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因而一般都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机构臃肿，管理环节过多，权大于法，个人说了算，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一方面直接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阻碍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妨碍决策的科学性，反过来加剧经济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上述两个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能够正常发挥，甚至使人们很容易把社会主义与“落后”和“僵化”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而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对于社会主义已经经历和正在面临着的困难和问题，站在不同阶级立场和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 would 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敌视社会主义，看不到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人把这些困难和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从而得出反共、反人民、反历史潮流的错误论断。基辛格1988年10月对南朝鲜《东亚日报》记者谈到二十一世纪时说：“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衰落。没有人认真严肃地相信共产主义有办法解决我们所处时代的经济问题。”我国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也随声附和说：“二十一世纪给人类最大的遗产是两项：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尝试及其失败”，“人们尽管嘴里不说，但用自己的改革实践来确认社会主义的失败。”^③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革命者，却从社会主义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看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即改革的社会，困难和问题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关键在于要承认并正视这些困难和问题，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逐步克服和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消除各种弊端，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在这个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本身，尤其是某些人借这些困难和问题而发表的耸人听闻的言论，的确也会形成一定的“大气候”，成为党的建设中不容忽视的宏观环境条件之一。

总之，一方面是西方资产阶级强化自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攻势，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面临着的困难和挑战，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国际大气候。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图谋确实已经有了在某些地区实

现的可能性；共产党改变颜色，放弃领导和执政地位而蜕化成社会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局部出现逆转，都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给党的建设提出了十分严峻而又非回答不可的新课题。

二、对国内小气候的重点认识

从国内来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各方面变化很大，成绩不小。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别的其他原因，党风和社会风气一直没有根本好转，或者说，一些旧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又有一些新的问题冒了出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地指出的：“我们现在的状况还远不是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这里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的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历史地面临着过去从未有过的一种国内小气候。形成国内小气候的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我们在此仅重点地作一些认识和把握。

1、商品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经济基本上是按指令性计划管理的产品经济的模式，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实践证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搞活社会主义经济、活跃城乡市场、改善群众生活、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有效手段。十多年以来，对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人民群众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也带来了一种全面的冲击。这种冲击对各种社会管理和协调机制，对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党的建设，对过去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和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过去，农村生产（包括副业生产）都是集体组织的，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和行政领导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又是生活资料的分配者，手中握有不小权力，说话有人听，发令有人行，组织生活也就好开展。现在，生产以一家一户的形式进行，一部分农民（包括党员）离乡离土外出做工经商，使得党的组织生活很难正常开展，支部委员会觉得工作难做或无事可做。部分党员组织观念淡薄，个别的甚至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提倡广大党员做勤勤恳恳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思想工作跟不上，放任自流，一些党员就只知道忙于挣钱，一心致富，淡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逐渐丢掉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现在，共产党员中，违法乱纪钻政策和改革的空子者有之，办皮包公司买空卖空者有之，以次充好搞坑蒙拐骗者有之。这些，虽说只是党员中的极个别现象，是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的逆流，但影响很坏，对党的肌体腐蚀性很强。

其次，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也波及到一些部门团体、事业单位甚至党政首脑机关的

部分党组织和党员群众。一段时间，各种挂靠公司纷纷成立，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千方百计为本单位和个人争取“经济效益”。虽然说各种公司的成立在搞活流通、发展经济方面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总的看弊端和不良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官倒、行贿受贿、奢侈浪费讲排场、非法暴发户的出现，大都是“公司热”的产物，广大群众对此极不满意。现在，官倒和公司热问题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理，但这一切在广大党员、干部中的不良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冲击的余波仍然存在。

第三，受商品经济大潮冲击和影响最厉害的，还是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列宁说：“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要求，是在入党时就应当解决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两点的结合和统一中，形成了长期以来鼓舞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精神、刘胡兰精神、董存瑞精神、黄继光精神、欧阳海精神、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等。总之，共产党人就是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就是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唯一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但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共产党员淡化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一些“原则”如“少投入多产出”、“等价交换”、“利益激励”等作为处理个人和组织、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的准则，从而演绎出拉关系、走后门、以权谋私、金钱开道、呼朋引类、占山为王等那一套庸俗腐败的作风。有的共产党员因此而沦为经济犯罪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这些，当然和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个人的阶级本质等有联系，但商品经济大潮对道德观、价值观的冲击也是造成一些党员蜕化变质的外部条件之一。

由上可见，对于党的建设来说，商品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是当前应该注意的首要的小气候条件。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在深化，商品经济还要进一步加速发展，在这一社会环境中要把党的建设搞好，就不能只看到商品经济发展对生产力提高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2、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不时泛滥。

若干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不时泛滥，也是对党的建设影响颇大的国内小气候的主要因素。从1980年前后的西单民主墙，到1983年的精神污染，从1986年底的学潮，再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集中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原因，除了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支持和鼓动外，还可以指出这样三个主要之点：第一、个别人顽固坚持民主个人主义而实质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一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以“学者”、“精英”的面目出现，在“提倡改革”、“解放思想”的幌子下，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诬蔑共产党领导“不行”，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专制”，而对西方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却奉为至宝，颂扬备至，到处兜售，主张“全盘西化”乃至“殖民地化”，这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引起连锁反应；第二、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知之甚少，

空有一腔热忱而缺乏必要的鉴别能力，往往盲从轻信，极易受人蛊惑煽动，跟着发表一些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言论，互相影响，甚至采取一些过激行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某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支持者；第三、党的建设不适应急剧变化了的形势，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有所削弱，有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舆论导向的控制；阶级斗争观念淡漠，在斗争中表现出某种软弱涣散，战斗力下降；党自身肌体受到一定程度的腐蚀，个别党员蜕化变质，成为某些人反对党的领导的机会。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自由化思潮泛滥愈演愈烈，最后酿成1989年的那场风波。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是近年来我国国内小气候形成的重要动因之一，对国内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特别是在青少年学生、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中的影响不能低估。问题在于，部分党员在一段时间内对这种现象或听之任之，或随声附和，形成一种极不正常的气候环境。这种不正常气候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影响到党的建设。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象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⑥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党的建设都不得不考虑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国内小气候因素的存在，并对此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总之，国内小气候的构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只重点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不时泛滥这两个方面作了一定的认识和把握。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两点与党的建设关系极大；另一方面，我们还认为，把握了这两点，也就把握住了近年来国内小气候不利方面的主要特点，而且这一主要特点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所从未有过的，是新的历史时期特有的现象，是应该予以充分重视的。

三、当前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课题

全面地说，党的建设应该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等诸多方面，但本文不准备论述全面的党的建设问题，而只打算从“联系实际”出发，谈一谈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提出的一些新课题。我们的观点是：除了一些长期坚持的“基本建设”外，不同时期党的建设要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在建国前夕适时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⑦这可以说是从时局发展特点出发抓好党的工作重点和自身建设的典范。当前，正象许多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社会思想问题的解决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当然也离不开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这一重要的环境条件。从这一环境条件出发，我们党面临着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和处理好党的外部关系这两方面的大课题。

1、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从气候环境条件和党的当前状况出发，党的自身建设应着重抓好下列三件大事：

第一、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政治方向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为宗旨，以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自己的建党原则。近年来，某些人妄图改变党的性质和方向，要把党变成所谓“精英党”、“知识分子党”、“全民党”，同时鼓吹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搞政治多元化，目的是要党放弃共产主义目标和改变政治方向。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要坚持在工人、农民、士兵、干部、知识分子中发展其优秀分子入党，而且在入党时和入党后重点考察申请人和广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否牢固。为此除进行经常性的学习、教育外，我们认为还应当坚持“退党自由”的原则。一些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念，不愿意执行党的方针和决议，不愿意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可以随时提出退党，或由组织出面劝令退党，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兵不在多而在精”，党员队伍更是这样。退党的人，只要爱国、守法，可以继续担任公职，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但一般不准其重新入党。党的各级领导，尤其是上层领导，应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方向，注意其方针政策正确性、坚定性和连续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有权对此进行监督。

第二、坚持经常用整风的方法搞好党员的思想、政治和作风教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不再搞政治运动，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但是，不搞政治运动并不等于放松思想、政治和作风教育。结合一段时间的实际，结合不同行业、部门的特点，开展一定范围的整党整风，正是这种教育的好形式，是随时可以进行的。在整党整风中，主要是坚持正面的学习和教育，但同时也应包含揭露缺点和错误，打击违法乱纪行为。在党内，要通过整党整风揭露官僚主义、渎职行为和各种贪污腐败现象；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搞好廉政建设，强化公仆思想。思想、政治和作风教育上去了，一支坚定自觉、廉洁肯干、高效守纪的党员队伍就会逐渐建立起来。有了一支好的党员队伍，就什么事都好办，什么困难也压不垮我们；党员有了自觉、自信、自尊、自强的共识，就能够更好地带领群众前进；党员既做群众的带头人，又做群众的贴心人，党也就会兴旺发达起来。

第三、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接班人，使党自身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使党开创的事业千秋万代继续下去。要使我们的党兴旺发达，让事业继续下去而勃兴发展，就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长远之计。培养和造就接班人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注意对青年党员的关心、爱护、教育、培养、使用、提高，为他们成才和施展才能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同时坚持选拔干部的“四化”方针，任人唯贤，让党内的青年人都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健康地尽快成长，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中坚和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其二，重视和加强对青

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士兵、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技术教育，并在条件较为成熟时进行党的知识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并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及时吸收到党内来，增加党的新鲜血液。通过上述两方面的有力措施，使党具有足够的、高质量的后备军队伍。前些年，党对青年教育工作有所削弱，这一教训应该记取。在党具有足够的后备力量的同时，还要继续注意把这一后备力量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能力、有魄力、善于团结人、善于集中正确意见的杰出人才选拔出来，及时送上领导岗位、授职权、压担子，把党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并发扬光大。

上述三点，都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课题。十分明显，做到了这三点，党的内部建设的主要方面也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民间有一句颇富哲理的俗语：“打铁还靠本身硬。”党的自身建设，无疑是整个党的建设的根本，自身建建搞好了，党也就能做好各项工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有效地抵制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图谋，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2、处理好党的外部关系。

我们的党作为一个拥有数千万党员的、在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国家执政的党，除了加强自身内部建设外，还必须处理好一系列外部关系。从当前面临着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出发，我们党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和利用执政地位，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加强和改善“三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方向。毫无疑问，这也是目前党的建设中不可稍有忽略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⑧生产力发展了，国民经济搞上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一方面可以说明社会主义能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和调节，克服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另一方面让人们能不断地改善生活，得到实惠，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和信任感。这样，党的形象就会改善，党的号召力、自信力和战斗力也会增强。因此，我们把提高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党的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第一个外部关系。当前，要保证党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的真正实现，保证人民群众在十年后都能过上小康生活，首要的就是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为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基本路线教育，结合党员所在各行各业的实际，摆问题、找差距，切实弄清楚本部门本单位到本世纪末实现战略目标存在的困难，树雄心、鼓干劲，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本部门本单位战略目标的实现。这样，党的建设不但具体化了，而且也就和岗位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要加强、改善我们党的执政党地位，还要坚持和完善“三管”，即党管军队、党管

干部和党管意识形态。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他又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①这些意见，至今仍然适用。长期以来，我们在坚持党管军队、党管干部方面做得比较好，正因为如此，才迅速平息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但是，在一段时间，党管意识形态的工作却有所放松和削弱。为了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应该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理论队伍，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有关重大问题，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图谋及我们的对策；同时，通过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广大的党外学术理论研究者、宣传教育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党要随时掌握一定的调控手段，注意宣传舆论导向，决不能对一些新闻出版单位放任不管，任其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甚至干出危害社会主义、危害人民和青少年的事。除了抓好这些单位的领导班子、编辑班子建设外，还要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补贴政策，对好书出版给以资助，对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书课以重税，对出版印刷违禁书刊的坚决打击。当然，要把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党管意识形态的“三管”工作真正做好，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做长期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句话，要把“三管”当成党的建设的工作常抓不懈。

总之，抓好上述党的自身建设并处理好党的外部关系，才算抓住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主要环节，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说的党的自身建设和处理好外部关系，绝非泛泛而论的老生常谈，而是具有特定的针对性的，其具体内容要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由时局发展的特点决定。当前，就是要认真分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中影响党的建设的主要因素，从这两方面制定强有力的对策措施，迅速增强党的自身战斗力，恢复党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带领群众把社会主义的事办好，努力实现九十年代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在纪念党的七十周年诞辰的时候，作为一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普通党员，我写下了上面的一些认识和看法，以供有关部门和同志们参考。不当之处，切盼批评指正。

注释：

- ①转引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5页。
- ②1958年12月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 ③见1989年1月台湾《联合报》。
- 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23页
- ⑤《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0页。
- 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0页。
- 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7页。
- 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3页。
- 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2、第493页。